

#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构建、受制与应对<sup>\*</sup>

## 厉平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山东日照 276826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与中国文化外推意义重大, 至今未有研究就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构建、受制因素与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因此, 本文拟在厘定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经典”含义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路径、构建的内外部条件, 进而剖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受制因素, 并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研究发现,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建构与译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意义空间、翻译选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译作评论与推介、社会对文学英译的认识大环境等内外因素有紧密联系。加强中国文学作品的艺术创作、翻译选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译作的评论与推介, 优化社会对文学英译的认识大环境, 有利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英语世界; 经典化; 构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6) 01-0009-09

### 0. 引言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与中国文化外推意义重大。程章灿 (2007)、胡安江 (2009) 分别对韦利译诗的经典化以及寒山诗、《聊斋志异》等单部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行了探讨。另外, 译界学者从多角度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进行了探讨, 如马会娟 (2013)、Eoyang (1993, 2003) 等从读者、作家、译者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接受问题。江帆 (2007)、马红军 (2006) 通过读者调查、图书馆图书借阅量、Amazon 图书网书评等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然而, 至今未有研究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的构建条件、受制因素以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因此, 本文拟在厘定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经典”含义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路径、构建的内外部条件, 进而剖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受制因素, 并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

### 1.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 1.1 “经典”和“经典化”

“经典”(canon) 源自古希腊的 *kanon* (意为“尺度”), 长期用以指被教会权威确认为

收稿日期: 2015-05-11; 作者修订: 2015-11-30; 本刊修订: 2015-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2013XG002); 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WXJ26)

作者信息: 厉平 (1977-), 女, 山东日照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翻译史, E-mail: liping7717@163.com。

《圣经》中属于“真经”的篇目，否则便是“伪经”；后来扩展到文学研究的领域，指被权威专家确认为天才性和独创性创作的作品。(Wolfreys & Robins 2002: 15) 陈定家(2008: 42-43)认为，文学经典至少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为世人常用的名著。其次，经典是具有百读不厌且常读常新之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第三，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而产生世界性影响。第四，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第五，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单语文学中的“经典”含义具有为世人常用、艺术价值高、跨越国界而具有世界影响、经久的生命力等特点。那么，翻译文学“经典”如何界定呢？查明建(2004: 87)认为，“翻译文学‘经典’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如朱生豪译的莎剧、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杨必译的《名利场》等；二是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指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canonized)了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作品”。在这三种含义中，经典的存在均由一种语言文化空间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空间，阅读受众变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空间里的读者。略有不同的是，第一种是著名译者的译作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经典化，第二种指的是作品原先在原语文学系统中是经典，第三种则指的是译作在译入语环境中逐渐被经典化。本文所借鉴的是第三种含义的“经典”。

综上，在借鉴“经典”内涵和翻译文学“经典”第三种含义的基础上，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经典”可界定为：经过翻译而成为英语世界读者的百读不厌之作，并具有超越民族与国界的影响，经过不断再版与重译，得以在英语世界经典化了的中国文学作品。

“经典化”(canonization)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韦利译诗的经典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和方式。它在商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不断出版和再版，得到了汉学界、知识界、读书界进而是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的肯定。韦利译诗在诗歌界被当作英语诗歌来欣赏，成为汉学界学者和学生的必备书目和图书馆的常备书目，这已标志着韦利译诗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后来，韦利译诗的传播面从英语世界扩大到英语以外的其他西方世界，被视为诗歌和翻译作品两个领域的世界经典。《牛津现代诗选》、《企鹅版当代诗选》等收录韦利译诗；权威文学作品选集《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选编了韦利翻译的《诗经》16首。英语世界的多种权威中国文学选集，如白之选编的《中国文学选集》和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等选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文集》(第一卷)均收录了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朱徽 2009: 127-128) 韦利译诗的经典化路径被视为中国古诗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重要标志。从韦利译诗开始，越来越多的汉诗英译作品被收入重要的或权威性的西方文学选集或工具书中。

## 1.2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路径

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90: 17、19)指出，每个时期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一个翻译文学系统，但每个译作在其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同时，另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并且“一般而言，整个多元系统的中心，就是地位最高的经典化形式库”。由此可知，处于翻译系统中心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成为该系统中的经典译作。埃文·佐哈尔(1990: 19)对文学系统中的经典做了“静态经典”与“动态经典”之分：前者“针对文本层面”，“即一个文本被接受为制成品并且被加进文学(文化)希望保存的认可文本群

中”；后者“针对模式层面”，“即一个文学模式得以进入系统的形式库，从而被确立为该系统的一个能产的原则”。

这两种类型的翻译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英译史上都出现过。如韦利翻译的《西游记》译本 *Monkey* (《猴》)，以美式和英式英语在英美出版，并不断地再版；韦利本人又在1944年推出此译本的改写本，专为儿童读者阅读，如此一来，《西游记》的韦利译本便成为“静态经典”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汉学家译者尤为青睐翻译神魔题材的中国古典小说，如《聊斋志异》、《搜神记》、《中国神话故事集》、《唐写本搜神记》、《今古奇观》等，而且这些神魔题材小说的英译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成为翻译系统中一个能产的原则，这种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路径可谓是埃文·佐哈尔所言的“动态经典”。

那么，这些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是如何迈向经典化的呢？

## 2.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经典的构建条件

### 2.1 文学经典的内外构成因素

就文学经典的构建条件而言，目前西方文艺界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即将经典的构成条件限定在文学作品内部；一种是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即认为经典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所发明出来或至少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的美学条件。国内文艺理论界主张将两种观点结合，构成了文学经典建构六要素——“一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四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五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六是‘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的价值取向。其中，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三、四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童庆炳2005：71）刘象愚（2006：51-54）从内外两方面阐释经典的生成因素，外部因素指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读者的阅读与判断。内部因素指经典的本质特征，即“经典性”，如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

童、刘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经典化离不开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童庆炳的分类更加清晰，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内部因素包括该作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空间，外部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文学界与文学批评界的肯定和揄扬。笔者认为童庆炳所总结的内外连接者——读者和发现人或赞助人相对于作品文本本身理应属于外部因素。刘象愚的内外因素说更侧重于外部，即人的因素的研究，内部因素的内涵概述较为全面，特别是实质上的创造性和时空的跨越性为文学在其他文化空间的传播和经典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总的说来，文学经典化的内外因素说可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生成提供借鉴。但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全面，鉴于文学和社会的紧密联系，外部因素中还应考虑社会、文化、政治甚至是出版商等因素。

### 2.2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外因素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部因素，指经典的本质特征，即“经典性”，涵盖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前文已经指出，我们所探讨的是在译入语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了的翻译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原作在原语文学系统中有可能是经典（如《西游记》），也有可能是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如寒山诗）。

但可以确定的是,原作一经翻译,在译语文学系统中取得经典的地位。除了具备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读者的阅读与判断等因素,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外部因素要比单语文学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复杂得多。试以《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为例。

《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道路足以证明翻译文学经典铸就离不开译作本身的文学性和可阐释空间。1877年,翟理斯翻译《西游记》为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佛国记》,又称《法显传》),译作包括翻译和注释两部分。1913年,李提摩太将《西游记》翻译为 *A Mission to Heaven* (《圣僧天国之行》),此译本承载了翻译的“以耶释儒”、灵活传教的功能。1923年7月底,翟理斯重译并出版了《佛国记》新译本,新译本的英文书名名为 *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 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930年海伦·M·赫丝重译《西游记》为 *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 The Record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佛国天路历程:西游记》),属于一百回节译本,同时对译本也进行了宗教阐释。韦利译本 *Monkey* (《神猴孙悟空》),于1942年7月出版,并在1942年11月、1943年、1944年、1945年多次重印,并被转译成多种语言文字,成为《西游记》英译本中影响最大的译本。在1944年,为吸引儿童读者,韦利就将其 *Monkey* (《神猴孙悟空》)一书改编为 *The Adventures of Monkey* (《猴子历险记》),由约翰·戴公司出版。该书仅包括《西游记》前七回(主要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书中附有插图名家库尔特·威斯(Kurt Wiese)所作插图,对儿童读者颇具吸引力。可见,《西游记》译作不断被阐释为宗教读本、儿童读本,亦有为当时的传教士迂回传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读者娱乐等功用,并得以不断出版、再版,铸就了它在英语世界的经典之路。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外部因素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前文提到的董、刘两位学者的阐释。首先是翻译问题。对于影响翻译的所有外部因素,都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另外,中国文学一旦被翻译进入译语文学系统,它的经典化又会受到译语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外部因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构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外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有力推手,又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阻碍。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道路见证了内外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 3. 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经典化的受制与应对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不断走向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并不理想,大多数国人认可的大作、经典之作,除个别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之外,在国外的接受度并不高。下面从经典化的内外因素着手探讨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经典化的受制与应对。

#### 3.1 中国文学自身的创作问题

中国文学外译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这一现象固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诗学、翻译等多种因素有关,但一些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的汉学家译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存在的创作问题制约了它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之路。

葛浩文认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作家遵循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创作原则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时间,中国当代小说家很多不懂外语,写作缺乏国际视野。“当代(中国)作家写作松

散、拖沓、粗糙，需要精细打磨”。(Goldblatt 2000: 26-27) 试以文学作品的开篇为例。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篇通常不会出现具体的情节和人物，只是一些背景的描写，为全文故事的开启定下理性探索的基调，这种在西方读者看似乏味的创作手法恰恰是中国作家自认为写作的匠心独运之处。但是，这种开局却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迥然不同，往往招致读者的反感以及出版商的冷遇。(吴赞 2012: 100) 林丽君认为，英美读者习惯先看小说的第一页，来决定这个小说是否值得买回家读下去；而中国作家往往不重视小说的第一句话，中国的读者却对此十分宽容，很有耐心地读下去。国外的编辑认为小说需要好的开篇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李文静 2012: 59)

应该看到，葛浩文的观点存在片面性，他所指出的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和写作的国际视野并不是中国作家创作的根本问题，他所认为的中国作家创作具有政治原则也只是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作家群体与任何时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特点，不具代表性；另外，关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技巧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英语文学系统的文学创造技巧，保持中国文学创作的本身优良传统并加以创新，是中国文学走向英语世界的前提。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2004) 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基本力量归纳为三种，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勒菲弗尔 (2004: 19) 指出，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因此，汉学家译者指出的中国文学创作技巧问题，主要是源于两种语言文学系统存在的诗学差异。这种诗学差异不能用作评价一国文学创作的优劣标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学作品本身是它走向英语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保证。中国古典小说在英美的翻译与传播就是力证。就连因大肆改写《骆驼祥子》(Rickshaw Boy) (1945) 和《离婚》(Divorce) (1948) 而备受诟病的伊万·金 (Evan King) 也是选择了中国当时优秀作家老舍的作品进行翻译，他的译本对老舍及其作品在英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具有积极意义。这些例子均让我们看到译者选材对原作者和原作品的倾向性，也从侧面说明加强中国文学自身创作的重要性。因此，加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创作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根本保证。

### 3.2 中国文学翻译存在的问题

#### 3.2.1 翻译的语言问题

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窗口，承载着语言和文化交流的双重任务，而它逐渐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外推的瓶颈。试以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进行阐释。

外国译者在翻译中文小说时经常会遇到对汉语理解不准确的问题。现任法国 Philippe Picquier 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 (2011: 40) 认为，好的中国文学作品遇上好的译者便是译作接受的契机之一。因为，有时译者中文理解水平有限，会把最精彩、最美妙的地方当作废话甚至错话自行删去，结果译作语言风格大打折扣，只剩下讲故事了。汉语中的人名、地名等文化词常常内涵丰富，如何将这文化词传达的意义翻译出来，完整再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将中国人的思维和情感真实地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这是外国译者翻译中文小说遇到的普遍难题。甚至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英美译家也会遭遇语言门槛的问题。在 Rickshaw Boy (《骆驼祥子》) 中，伊万·金采取了按字面直译的方法对人名、地名、谚语方言等进行翻译。原作者老舍首先对英译本中的人名的翻译方法提出质疑，他在

1948 年 10 月 21 日致劳埃得的信中说“在中文中‘祥子’的‘祥’可以解释为‘忠实’‘幸运’‘吉兆’‘成功’等意。”(舒济 1992: 182) 英文中的“Happy Boy”很明显不怎么贴切。而华人译者在将中国文学翻译到其他国家时, 会遭遇英语表达的障碍, 就连美裔华人王际真在 1947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英译选集 *Stories of China at War* (《中国战时故事》) 中翻译端木蕻良的小说 *Beyond the Willow Wall* 时, 将主人公的名字“石头”音译为“Shih Tou”, “二虎子”音译为“Erh Hu-tzu”, “高粱”直接音译为“Gaoliang”, “爹爹”音译为“dieh-dieh”。一些感叹词, 也采取了同样的音译处理法, 如“Ai-yo-o”(哎哟哟、“Ai”(哎)、“Fangpi”(放屁)。王际真采用直译法翻译小说中的中国特色元素, 这在 20 世纪上半叶英译中国现代小说的初期为英美读者带去中国文化的异域情调, 无疑对吸引读者的注意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在译入语国家读者不懂这些文化内涵时, 采用直译文化词的策略不利于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如何使译作符合译入语的特点、又能最大限度地再现中国文化, 这是中国文学的世界经典化的旨归所在, 若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面目全非, 则也失去了中国文化外推的意义。

### 3.2.2 翻译选材的考虑

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选择, 是照顾我们中国人的选择意向, 还是迎合外国读者的口味? 笔者认为, 这不是二选一的简单问题。1981 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外文局) 下属中国文学杂志社负责翻译出版“熊猫丛书”, 希望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和文化(重点是现当代文学) 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 以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然而, 接受效果不尽如人意。耿强(2012: 5) 认为, “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偏重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熊猫丛书’对其他题材的选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丛书并没有对外充分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实际的发展状况”。难道一定要选择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发展状况的作品进行英译, 那样接受效果就会理想吗? 笔者对之不敢苟同。

20 世纪上半叶进行中国小说英译的外国译者涵盖汉学家、教师、作家、外国记者等, 他们英译中文小说的目的各不同, 如传教士汉学家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英译《西游记》、德莫朗(George Soulie) 英译《聊斋志异》虽为中西交流做出了贡献, 但其主要目的是借助翻译实现传教士在当时中国不断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情况下进行灵活传教的目的; 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编译了 *The Chinese Fairy Book* (《中国神话故事集》)、倭讷(Edward Werner) 编译了 *Myths & Legends of China* (《中国神话与传说》)、卜朗特(I. Brandt) 编有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汉文进阶》), 他们或借助翻译研究中国文学, 或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或在英译本前言中言明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而译书。再如, 抗日战争时期, 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的外国译者大多跟国内文学界、革命界人士联系密切, 如斯诺、鲁迅等。斯诺想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真实情况反映出去, 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 而鲁迅等中国作家也希望中国作品能够传播出去, 以此复兴中国文化。这样, 外国记者和中国作者共同的诉求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译传播。总之, 在 20 世纪上半叶英译中文小说的活动中, 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青睐、外国记者对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英译, 可以说明恰当的翻译选材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译入语国家社会的需要。

### 3.3 文学翻译的评论与推介

翻译评论在中国文学走向经典之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舆论的导向可以同时成就或

是毁掉一部译作。由于评论界对《西游记》翟理斯英译本的较高评价，1923年7月底，翟理斯重译并出版了《佛国记》新译本，新译本的英文书名为 *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 – 414 A. D.) ,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而且因其印刷精美而获得了“精美图书奖”。据翟理斯本人统计，当时的西方媒体中共有32篇评论文章，其中30篇对玄奘西天取经的经历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这个译本中，由于翟理斯指出佛教的“三位一体”观念早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并做出了“在玄奘西天取经的光芒之中，圣保罗之旅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一断言，导致新译本引起了不少教中人士的不满。1923年10月号的伦敦《东西方》(*The East and the West*)杂志就把翟理斯的这个译本骂得“一文不值”，而且称翟理斯的前言“毫无学术性”，“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相反，《阿伯丁出版物及学术杂志》(*Aberdeen Press and Journal*)则认为这本书具有“学术性”。而《东西方》杂志上的书评认为，“玄奘西天取经”纯属“凭空想象出来的”。翟理斯反驳说，如果佛教徒也把基督教徒奉为神圣之物的基督教画像说成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基督教徒会怎么想呢？翟理斯指出，“这种有失水准的话还好是出于一本教务杂志”。<sup>①</sup>

能否获得英语世界的出版市场和机构（文学评论机关、奖项等）的认可，也是中国文学迈向经典化道路的重要因素。蓝诗玲（2011）指出，中国小说欲在国外出版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在英语世界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就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领域。如此一来，不但在商业市场没有销路，而且普通读者是不会把学术出版社的译本或节译本当作文学经典的。林恪（2011）建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译者应该选择专门出版经典系列的出版社。出版商因素在中国文学迈向经典过程中时虽起不到决定性影响，但仍然非常重要。老舍曾提到自己的《离婚》全译本在美国并不好卖时说“美国人搞文化，就跟做生意差不多。一本书出版，先得在各方面大做广告，明星也能代你吹上一通，戏院、药店……都得有小广告，再加上广播，那才成，否则，什么书都别想卖”。（张桂兴 2005：148）可见，商业出版社虽然更多地关注商业利润，但同时也带动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

### 3.4 社会对文学英译认识的大环境

2007年国际笔会对国际文学翻译境况的年度报告反映出文学英译的国际现状不容乐观，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处境。在2006年7月，美国的“图书文化中心”（Center for Book Culture）发布了2000~2006年间在美国出版的各国现当代文学翻译作品主要是小说翻译出版情况的研究数据，重译和作品选集不包含在此范围之内，报告中统计了39个国家的小学英语译数据，令人不解的是，竟然没有中国小说的英译。（Allen 2007：25 – 26）桑稟华（2011：121 – 122）用数据呈现了翻译小说的数量问题。从1990年代起，汉译外国文学的数量占中国出版市场的30%。2004年中国进口了10 040个版权，但只出口了1314个版权。相对而言，翻译文学占美国出版新小说的3.54%。同年，中国出版社购买了3932本美国书，而美国出版社只买进了16本中文书。

面对不容乐观的文学英译的国际现状，国家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英译，这有利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建国后不久，专门负责中国书刊对外宣传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1963年改名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便将对外翻译中国文学列入对外宣传的重点之一。于是《中国文学》杂志于1951年10月创刊，致力于向国外介绍

反映中国现实的优秀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面貌。叶君健担任副主编,主持杂志的编译工作,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承担了大量的对外翻译的任务。《中国文学》杂志也成为建国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窗口。(吴旻 1999)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 20 世纪的 80、90 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主持编辑、组织翻译、出版的《熊猫丛书》承担起向外译介中国文学的任务。(谢天振 2014: 2) 这套丛书先以英、法,后增加少量德、日语言,希望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和文化(重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以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标举“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旨在让“中学西传”的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丛书出版了,规模宏大,拟译选题达 200 种,几乎囊括了全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传统文化典籍。迄今为止,这套丛书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百余种选题,一百七十八册,然而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不难发现,新中国建国 60 多年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相关翻译出版部门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一事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怀,组织了一大批国内外的翻译专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谢天振 2014: 2) 但也引起了报刊媒体的关注,能够促使国内学者对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事业不断深思,将其不断向世界文学的舞台推进。

#### 4. 结语

在厘定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经典”含义的基础上,本文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外部条件入手,探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受制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研究发现,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建构与译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意义空间、翻译选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译作评论与推介、社会对文学英译的认识大环境等内外因素有着紧密联系。加强中国文学作品的艺术创作、翻译选材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译作的评论与推介,优化社会对文学英译的认识大环境,有利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 注释:

- ① 引自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0vfTTySncyooHuvrq0hGlV3\\_U3RwbnTIQ4R9Qz\\_p8G12RW4sW6GpSkIKmmfCGKxd](http://baike.baidu.com/link?url=0vfTTySncyooHuvrq0hGlV3_U3RwbnTIQ4R9Qz_p8G12RW4sW6GpSkIKmmfCGKxd)。

#### 参考文献:

- [1] 陈定家.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 [J]. 文学评论, 2008, (2): 42-46.
- [2] 陈丰. 中国文学翻译在法国 [C] // 中国作家协会. 翻译家的对话.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37-41.
- [3] 程章灿. 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7, (1): 31-45.
- [4] 耿强. 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 [J]. 上海翻译, 2012, (1): 1-7.
- [5] 胡安江. 美国学者伯顿·华生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6): 75-80.



- [6] 江帆. 他乡的石头记 《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7] 蓝诗玲. 英译中国文学: 英语出版所面临的问题 [C] // 中国作家协会. 翻译家的对话.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81-84.
- [8]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 [J]. 中国翻译, 2012, (1): 57-60.
- [9] 林格. 中国文学在荷兰的译介状况: 困难与可能性 [C] // 中国作家协会. 翻译家的对话.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95-99.
- [10] 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 (2): 44-58.
- [11] 马红军.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12] 马会娟.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 现状与问题 [J]. 中国翻译, 2013, (1): 64-69.
- [13] 桑奘华.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小说 [C] // 中国作家协会. 翻译家的对话.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121-124.
- [14] 舒济. 老舍书信集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 [15] 童庆炳.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5, (5): 71-78.
- [16] 吴旻. 《中国文学》的诞生 [J]. 对外传播, 1999, (6): 24-25.
- [17] 吴赞. 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以白睿文、陈毓贤英译《长恨歌》为例 [J]. 中国翻译, 2012, (3): 98-102.
- [18]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 (1): 1-10.
- [19] 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2): 86-102.
- [20] 张桂兴. 老舍评说七十年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 [21] 朱徽.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22] Allen, E. *To be Translated or Not to be PEN/IRL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 Barcelona: Institut Ramon Llull, 2007.
- [23] Eoyang, E. C.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24] Eoyang, E. C. *"Borrowed Plumage": Polemical Essays on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Rodopi, 2003.
- [25] Even-Zohar, I. Polysystem studies [J]. *Poetics Today*, 1990, 11 (1): 17-19.
- [26] Goldblatt, H. Of Silk Purses and Sows' Ears: Features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s in the West [J]. *Translation Review*, 2000, (59): 21-27.
- [27]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8] Wolfreys, J. & R. Robins. *Key Concepts in Literary Theor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责任编辑 田园丰)